



從「傳體本事」到「虛構意圖」—— 紅學研究中「小說」概念的遞嬗及其影響*

蕭鳳嫻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紅樓夢》自清代作者稿本、脂硯齋評語以來迄今，無論古、今的中國讀者，都承認它是一本「小說」、屬於「小說」文類，也就是說他們都以自己的「小說」概念、「小說」理論，從事《紅樓夢》批評。可是，從近代日人以中國傳統的「小說」一詞，翻譯西方傳入的 fiction（虛構的敘事文學）一詞後，從清代開始迄今，這些《紅樓夢》讀者認定的「小說」概念，就有古代中國傳統小說「遊戲談柄、教化人心、闡述人生體驗」概念，與現代西方「小說」(novel、fiction) 概念，名同而實異的兩個不同系統。這兩個系統互相交涉、對話，形成了龐大的紅學論爭與學說。是以，當代紅學小說概念研究，當然避不開「小說」(novel、fiction) 古、今義的演變、發展，與古、今義之間過渡與轉化的探討。因為各時期相關的紅學資料浩瀚，為了便於討論的展開，本文借助余英時建立的紅學典範系譜，針對《紅樓夢》作者、脂評、

* 本文曾宣讀於 2012 年慈濟大學東方文化研討會，感謝講評人簡文志教授修改意見。更感謝南華文學學報三位匿名評審修改意見，讓本文能更深入剖析問題。



索隱派紅學、自傳派紅學、余英時「新典範」紅學，這些「小說」概念進行研究，探討古代中國傳統「小說」概念與西方「小說」概念，互相匯通、遞嬗的影響過程。

關鍵字：小說、紅樓夢、紅學、余英時。



**From the Art of Statement about “the Official
Style of Commentaries on Classics” to the
Presentation of Authors’ “fictitious
intention”--The Transformation in “fiction” of
“Redology”**

Hsiao Feng-Hsien

Abstract

Regarded as books containing anecdotes in ancient China, the concept of novel can be deemed the fictitious literary genre. Comparing with modern western “fiction”, it belongs to different systematic concept. The study of “Redology” is always a controversial issue. That’s why Yu Ying-shih constructed “new paradigm” of Redology, attempting to solve problems and set up standard for Redolog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cademic History. Although his ambition failed, pedigree he constructed helps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uthor’s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situation reproduction of reality or simulation in author’s works. Regardless of red-inked commentaries, figurist Redology,



autobiographical Redology, or Yu Ying-shih's New Paradigm, the research in fact shows that they all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after converting and completing the integ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 concept with western "fiction" tradition.

Keywords: Fiction,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Redology, Yu Ying-shih.



一、前言

「紅學」是指研究著作於中國清朝中葉、長篇章回小說《紅樓夢》的專門學問。這門學問的內容包括了《紅樓夢》主題、人物、作者生平、版本、思想、藝術研究；及與其他中國古典名著、西方小說名著比較研究；紅學史研究等範疇。這門學問在中國與海外華人學者的發展史，依據陳慶浩的分期可分為：(一)與《紅樓夢》稿本同時出現的脂評時期，特色是繼承了明末清初李卓吾以來，即興、印象、讀後感式小說品評傳統。(二)從《紅樓夢》開始流入社會，出現五花八門、各式各樣論點、沒有陳述證據的舊紅學時期。(三)胡適提倡以科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發表〈紅樓夢考證〉一文，開啟史學考證性質研究的新紅學時期。(四)70年代後注重文學研究資料、方法的當代紅學時期¹。這門學問的特色是：(一)對於《紅樓夢》主題是寫什麼？作者是誰？虛構故事或真實故事？等等問題，意見分歧、流派眾多、無一致答案，形成了種種解釋與爭論，而且各派互相吸收對方研究成果，加以轉化、據為己用、開展新論點、迄今不止²。(二)歷來從事《紅樓夢》研究的中國、台灣著名近、當代學者，讓紅學研究幾乎可說是包括了許多中國、台灣近、當代人文學術史研究面向。

¹ 陳慶浩：〈紅樓夢研究簡論〉，收於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2年7月)，頁253-314。

² 根據中國學者劉夢溪研究，新紅學時期至70年代的當代紅學，共有十七次的論戰、九次公案、四條不解之謎和三個死結。參見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337-437。近期的舊說開新論，著名的有中國小說家劉心武從秦可卿原型(秦學)的研究入手，揭示《紅樓夢》文本背後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力之爭。參見劉心武：《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台北：好讀出版社，2008)。中國學者土默熱提出《紅樓夢》新說，認為作者是洪昇。《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原型是蕉園十二釵。《紅樓夢》中的美輪美奐的大觀園是杭州的西溪。《紅樓夢》中的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的原型是京東的盤山。參見土默熱：《土默熱：紅學大突破》，(台北：風雲時代，2007)。



這麼長時期的發展歷史、這麼多紛亂的議題、這麼盛大的研究陣容，自然是中國紅學史家與中國近、當代學術史家，梳理、研究、評價的重要課題。中國出版的中國紅學史研究重要專書，最早於 60 年代，郭豫適因教學需要，編印《紅樓夢研究簡史》講義，80 年代正式成書《紅樓研究小史稿》出版，隔年出版《紅樓研究小史續稿》，80 年代中期韓進廉撰成《紅學史稿》。90 年代初期劉夢溪撰成《紅學》一書，2005 年增改為《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出版，90 年代後期白盾主編《紅樓夢研究史論》³。2000 年初期與中期陳維昭《紅學與二十世紀學術思想》與《紅學通史》⁴。2002 年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與 2008 年黃毅、許建平《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視角與方法》⁵，則是從中國小說研究史的視角，論述中國紅學詮釋方法學。香港、台灣學者紅學史重要專書與專書論文，有 70 年代陳炳良〈近年的紅學述評〉、潘重規〈紅學六十年〉、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紅樓夢的兩個世界〉。80 年代有陳慶浩〈紅樓夢研究簡論〉、龔鵬程〈紅樓猜夢：紅樓夢的詮釋問題〉。80 年代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一書，梳理了晚清紅學研究理論。2004 年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以學者為單位，梳理了他們的詮釋理論。2008 年香港學者洪濤《紅樓夢詮釋方法論》，以作者、文本、讀者為中心架構，企圖梳理紅學發展史上，讀者詮釋作者、文本、特殊讀者的種種接受方法，並指責各詮釋者以作者決定論為中心，強行附會個人理念的詮釋方法。2012 年香港學者張惠〈中美紅學之交鋒與雙贏：周汝昌與余英時對當今紅學研究格局之貢獻〉，分出中國、美國紅學兩種研究學派，以余英時、周汝昌代表中、美紅學，

³ 參見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頁 464-465。

⁴ 陳維昭：《紅學與二十世紀學術思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⁵ 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參見註 3 書。黃毅、許建平《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視角與方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闡述了兩人不同的研究方向、內容與優點。⁶

在兩岸三地這些中國紅學史重要著作中，居於承先啟後地位、開創詮釋理論典範、影響深遠的論述，當屬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二文，余氏檢討紅學史發展、建立紅學「索隱」與「自傳」兩個學術典範，典範危機（技術崩潰）及革命的紅學發展史詮釋架構，倡導透過瞭解整部作品，回到作者虛構意圖的「新典範」詮釋方法，與「新典範」理論下，《紅樓夢》兩個世界詮釋成果，成為後來的紅學史研究者依循的詮釋價值、典範，或建立己論的批判對象。如黃霖認為：余文在探討紅學未來發展論述中，最富理論性與影響巨大⁷。陳維昭從中國傳統經學方法、經學史流變、史傳方法來詮釋紅學，他認為索隱（舊）紅學用今文經學方法進行研究，自傳（新）紅學用古文經學方法進行研究。兩者不是兩種不同的學術典範，是互補、互滲、互相轉化的雙向運動。余英時的「紅學革命」與胡適的「新紅學」一樣，都有著極為廣泛的影響。都是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觀念、新視野、新領域，同時又把後來的研究者引入了殊途，連一些從事紅學史研究的學者也人云亦云，重覆他們一些不科學的方法或論斷⁸。洪濤認為《紅樓夢》研究，應該藉著作者視角、思想，來探討人類根本問題，而不是還原作者的特殊生活經驗。

⁶ 陳炳良：〈近年的紅學述評〉、潘重規：〈紅學六十年〉，收於潘重規：《紅學六十年》，（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年），頁 139-170。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收於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陳慶浩：〈紅樓夢研究簡論〉，參見註 1 書。龔鵬程：〈紅樓猜夢：紅樓夢的詮釋問題〉，發表於 1987 年 8 月第五屆世界比較文學會議，收於龔鵬程：《紅樓夢夢》，（台北：學生書局，2005）。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 75 年）。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台北：里仁出版社，2004）。洪濤：《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張惠：〈中美紅學之交鋒與雙贏：周汝昌與余英時對當今紅學研究格局之貢獻〉，（北京：紅樓夢學刊，2012 年第五期），頁 182-202。

⁷ 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參見註 3 書，頁 472。

⁸ 陳維昭：《紅學通史》，參見註 4 書，頁 295-303。



批評余英時《紅樓夢》詮釋方法，最終歸向仍是作者決定論，是追尋體現作者最終意圖的本子，不能斬斷與作者觀念的繫聯。並認為劉夢溪《紅學》一書，很明顯受到余英時的影響⁹。龔鵬程〈紅樓猜夢：紅樓夢的詮釋問題〉一文，承繼余英時回到作者意圖詮釋的看法，去除余英時主張《紅樓夢》兩個世界思想內在結構，吸收西方近代符號學、語言學方法論，我國文字學方法論、紅學索隱派拆字法。認為《紅樓夢》作者的意圖，是主觀運用文字的歧義性、弔詭性，賦予《紅樓夢》多義且自我消解的文學本質、哲學本質、文化存在價值¹⁰。

由此可知，上述這些紅學史家，以現代文學理論裡，作者中心論、研究方法客觀論、小說文類虛構論為基本概念，又各自有自己「史」的框架，來詮釋紅學史、評價歷史上各類型《紅樓夢》詮釋，他們的研究為紅學史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也留下一個待探討的「小說」文類「本體論」問題。那就是《紅樓夢》自清代作者稿本、脂硯齋評語以來迄今，無論古、今的中國讀者，都承認它是一本「小說」、屬於「小說」文類，也就是說他們都以自己的「小說」概念、「小說」理論，從事《紅樓夢》批評。

可是，從近代日人以中國傳統的「小說」一詞，翻譯西方傳入的 fiction（虛構的敘事文學）一詞後，從清代開始迄今，這些《紅樓夢》讀者認定的「小說」概念，就有古代中國傳統小說「遊戲談柄、教化人心、闡述人生體驗¹¹」概念，與現代西方「小說」（novel、fiction）概念，名同而實異的兩個不同系統。這兩個系統互相交涉、對話，形成了龐大的紅學論爭與學說¹²。

⁹ 洪濤：《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參見註 6 洪書，頁 8、278、301。

¹⁰ 龔鵬程：〈紅樓猜夢：紅樓夢的詮釋問題〉，參見註 6 龔書，頁 52-68。

¹¹ 參見袁進：《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2-3。

¹² 關於近代日人以中國傳統的「小說」一詞，翻譯從西方傳入的 novel（作者新奇的敘事文學）、fiction（作者虛設、編造、捏造、假想、虛構的敘事文學）一詞後，產生古代中國「小說」



是以，當代紅學小說概念研究，當然避不開「小說」(novel、fiction)今義、古義的內容、演變、發展探討，與古、今義之間的過渡與轉化探討。那麼，《紅樓夢》從作者自我敘述、脂評時期，到索隱舊紅學時期、胡適新紅學時期、余英時「新典範」時期，他們各自的「小說」概念，究竟為何？他們的發展是一脈相承？還是各有來源？目前為止都沒有答案，值得研究。

因為各時期相關的紅學資料浩瀚，為了便於討論的展開，必須取樣具有歷時性、典範性的作品。因此選擇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建立的「典範」論為研究範圍。依歷時性順序探討紅樓夢作者、脂硯齋評語、舊紅學「索隱」典範、新紅學「胡適」典範、當代紅學余英時「新典範」，他們各自的「小說」概念為何？理論內涵為何？彼此間的關係為何？期望可以達到為《紅樓夢》詮釋「小說概念」遞嬗與影響的初步研究成果。

二、作者：紀實傳信、性格刻畫作品

《紅樓夢》第一回中，作者以創作者的角度，說明了他的「小說」觀念：

我想歷來野史，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

概念(小說出於稗官，為野史、街談巷說之言)與現代西方「小說」(fiction)，兩個名同而實異的概念。可參見浦安迪：(Andrew H.Plaks)《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張哲俊：《東亞比較文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高小康：《中國古代敘事觀念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劇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¹³。

文學史家葉慶炳與小說理論史家劉良明，都認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這段文字，顯示了進步新穎「小說」觀念、「小說」創作獨創與革新¹⁴，但未詳言新穎與革新的內容。中西小說文類比較研究者楊星映則說「(中國)小說概念也經歷了紀實傳信、遊心寓目、虛實參半、虛構假託、情節鋪設、性格刻畫等等的變化。……近代意義的小說文體逐漸形成，到《紅樓夢》終於形成典型的人物(性格)、情節、環境三元結構的小說文體¹⁵。」誠然，這段文字言及「超越」野史、才子佳人書敘事(敘述故事)創作態度，是種有意識的創作小說觀念，接近現代西方「小說」強調新奇、創造的創作觀。強調「近人情」的敘述手法，呈現西方「小說」要求：人物(性格)、情節、環境敘事書寫藝術概念。但是文字中他也強調自己的作品，是「親見親聞」(基本資料)後，按照人物形象、事蹟撰寫，不穿鑿、不失真「小說」。敘述超越了先前野史的假借年代、誣謾失真、妖妄熒聽、猥鄙荒誕。與才子佳人書中，公式化、不近人情、不近情理的世間男女情愛、家庭生活故事。這證明他的「小說」概念裡，也有接近班固、紀昀等傳統中國目錄學家看法，認為「小說」著作中，有史傳真實性、真實經驗的體現成分存在，乃是傳述歷史故事(實事)的概念。可以這麼說，這段文字說

¹³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73 年)，頁 4。

¹⁴ 參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76 年)，下冊頁 410。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362。

¹⁵ 參見楊星映主編：《中西小說文體比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8。



從「傳體本事」到「虛構意圖」—紅學研究中「小說」概念的遞嬗及其影響

明：《紅樓夢》中幾個女子的故事，乃是有親見實事為本、再加以文字藝術化描寫，構成的「近人情」、「不失真」才子佳人事蹟。歷史人物真實敘述與文學描寫創作藝術，在此段論述中密切關聯。

因此，真實人物（實事）、真實世態（實事）、深切人情（人生體驗的藝術敘述），紀實傳信、情節鋪設、性格刻畫，這些傳統中國「小說」概念，與吻合西方「小說」的概念，參雜出現在《紅樓夢》作者「小說」概念中。

三、脂評時期：「傳體本事」敘述藝術

《紅樓夢》最早的讀者脂硯齋，在《紅樓夢》第一回作者以創作者的角度，說明了他的「小說」觀念，這段引文眉批說：

事則實事，然亦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致草蛇灰綫、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峙、烘雲托月、背面敷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秘法，亦不復少。余亦於逐回中搜剔刮剖明白注釋以待高明，再批示誤謬。開卷一篇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巢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¹⁶。

這段批語從事則實事開始，至敘述實事架構、手法、人物刻劃、情節環境的分析（敘得有間架、有曲折至千皴萬染），也是與《紅樓夢》作者持同樣「紀實傳信」基本概念。但著重作者如何以藝術手法，來描寫親見人物真實本事，詳細分析書中每回文字的本事、意義、藝術手法。末句說作者這樣的創作筆法是《莊子》、《離騷》的筆法？但什麼是《莊子》、《離騷》的筆法？脂硯齋並未

¹⁶ 參見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5年），頁10。



詳細說明。也許他是說：《紅樓夢》作者有與莊周、屈原類似的境遇？思想？寄託？也許是說《紅樓夢》作者有與莊周、屈原類似的文學辭藻？文學寓意？無論如何，前者是有所本的作者實事、後者是作者創作的藝術手法，還是「小說」實事與藝術手法並陳的分析策略。脂硯齋在《紅樓夢》第八回夾批、眉批，評論作者撰寫林黛玉與薛寶釵形象，這種實事與藝術手法關聯的觀念更是明顯呈現。他說：

這方是寶卿正傳。與前寫黛玉之傳一齊參看，各極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難其左右於毫末。畫神鬼易，畫人物難。寫寶卿正是寫人之筆，若與黛玉並寫更難。今作者寫得一毫難處不見，且得二人真體實傳，非神助而何¹⁷？

這是稱讚《紅樓夢》作者描寫人物的技巧高妙，但卻說呈現出來的人物形象，是林黛玉與薛寶釵兩人，現實世界中真實的人物體貌。第六十八回回前總評也說：

余讀《左氏》見鄭莊，讀《後漢》見魏武，謂古之大姦巨滑惟此為最。今讀《石頭記》，又見鳳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剛，站步高，留步寬，殺得死，救得活，天生此等人琢喪元氣不少¹⁸！

此處將小說《石頭記》與史書《左傳》、《後漢書》並列，小說人物鳳姐與歷史人物鄭莊公、魏武帝並列，由小說情節聯繫歷史、真實人生、人物，提出一己感觸與評語。此外，脂硯齋評語全文，除了點評《紅樓夢》敘述技巧、藝術外，有些批語也明白表示《紅樓夢》書中某些情節，是作者親身經歷、批者

¹⁷ 參見註 16 陳書，頁 182。

¹⁸ 參見註 16 陳書，頁 679。



親身經歷真實往事與發生年代，指明是現成文字、並非編造，提醒讀者要注意情節背後的實寫真事¹⁹。歷史本事還原與小說藝術技巧分析、思想主題闡述，根本同時存在於脂硯齋評語中，並且密切關聯。

由此可知，依《紅樓夢》脂硯齋的看法，「小說」是以真實人物本事為依據的敘述藝術作品。可分為野史與才子佳人書、《紅樓夢》三種創作類型，《紅樓夢》是他們理想的「小說」創作類型。是一種以種種敘述藝術手法，體現真人真事經驗，又「近人情」、「不失真」的人物敘述作品。這種「小說」本體論的概念，與西方「小說」（虛構）概念，傳統中國「小說」（史餘）真實概念，都有接近、吻合之處²⁰。

四、舊紅學「索隱」典範：「傳體本事」議論實錄

舊紅學索隱派紅學家，承繼「小說」為史餘觀念，著眼於《紅樓夢》本事真實人物研究，以文字名實拆解法，從字形、字音、語義角度，詮釋《紅樓夢》情節（關於索隱派紅學家詮釋價值觀、方法論與經學文以載道觀、小學名實觀、史學實錄觀的關係，前人已多所議論，在此予以擱置不談）。其成果大略得出「明珠家事、情史說」、「世祖與董鄂妃情史說」、「張侯家事說」、「傅恆家事說」、「和珅情史說」、「袁才子說」、「六王七王幕府情史說」、「爭天下說」八種本事說法，「明珠家事、情史說」、「爭天下說」其下又各有異說。「明珠家事、情史說」可分為寫明珠家事說、明珠子納蘭容若自敘說二種。「爭天下說」可分寫康熙朝諸

¹⁹ 參見註 16 陳書，頁 97-110。

²⁰ 浦安迪：（Andrew H.Plaks）研究了中國白話章回小說，與西方 novel 文類，本體論、原型、結構、修辭不同，認為兩者並不是等同的「小說」文類。將當代稱之為中國章回小說的文類，稱之為立基於歷史文化語境，以小說演義形式書寫，體現歷史闡釋話語的奇書文體。參見浦安迪（Andrew H.Plaks）《中國敘事學》，同註 12 浦書，頁 25-32。



王奪嫡說、漢滿種族爭鬥說兩種²¹。

縱觀以上索隱八說，可以發現除了「爭天下說」說法之外。這些紅學家指涉的本事人物，都是當代本就擁有眾多異聞傳說的風流人物。他們共同認為：作者是在表達某種議論興衰起落、褒貶品評善惡得失的寫作態度。換言之，《紅樓夢》是作者談說議論種種當代風流人物興衰起落，褒貶品評善惡得失的文字成品。也就是說「小說」的文類內容，是作者藉曲折的文字，廣議當代風流人物，勸戒世人。「小說」的特徵是作者表達評論意圖的寫作活動。這樣的概念與班固、紀昀等傳統中國目錄學家類似，視「小說」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寓勸戒、廣見聞的工具，認為「小說」著作中，有議論的小價值與小功用（不是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聖哲道理）存在的概念。清末民初以後，西方「小說」概念傳入中國，持此類看法的紅學家，也融入西方「小說」文類概念，認為「《紅樓夢》是稗史小說²²」即闡述、議論歷史人物本事、道理的小說。

主張「爭天下說」的紅學家，對「小說」的文類內容、特徵看法與主張其他七說的紅學家一致，但卻提高了傳統中國「小說」文類的地位、價值與功用，認為「小說」不是史餘、街談巷語，乃是作者針對當時的時代、社會、政治問題，書寫的真實事件，具有經國大業寓意，與學術、歷史的功用。如蔡元培認為：「《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²³」他以現代西方政治「小說」分類觀、思想價值觀，表述《紅

²¹ 參見蔡元培等原作、龔鵬程導讀：《石頭記索隱》，（台北：金楓出版社，1998），頁 3-55。

²² 如方豪：〈紅樓夢故事的人物問題〉、杜世傑：〈紅樓夢考釋序〉、李知其：〈論林黛玉與賈寶玉〉，參見蔡元培等原作、龔鵬程導讀：《石頭記索隱》，同註 21 書，頁 211、185、240。

²³ 參見蔡元培等原作、龔鵬程導讀：《石頭記索隱》，同註 21 書，頁 60。



樓夢》作品中，作者鮮明的漢族民族主義政治理念與思想。書中人物的塑造、情節敷陳顯露強烈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政治意識型態。作者針對漢族名士仕清這種政治環境，發出痛惜的寓意。並且認為作者是為了避開政治環境壓迫，故意虛構種種故事情節，混淆讀者認知。潘重規則是重新界定傳統中國「小說」概念，認為：「小說在中國古代是一門「學術」，小說家是「有益治道的諸子百家的一家，小說的作者是管莊孟荀一流的人物，小說家的作品，是儒墨諸家同類的學術文章²⁴。」《紅樓夢》「由明代遺民寫成，醞著民族血淚鑄成，書中所記的事實，是當代的信史，用隱語書寫亡國隱痛的隱書。其目標一是反清、二是復明²⁵。」換言之，他認為《紅樓夢》是明代遺民在亡國後，用隱語書寫的當代歷史與有益復國的學術文章。

由以上分析可知，舊紅學索隱派紅學家，雖然一致接受傳統中國「小說」概念，認為「小說」是作者議論歷史人物本事、道理實錄。但對「小說」文類地位、價值與功用，卻有「稗史」、「歷史」，「街談巷議」、「經國大業」，兩組不同的概念認知，不可混為一談。

五、新紅學「胡適」典範：「作者」時代反映故事

新紅學開山始祖胡適，以「考證」《紅樓夢》的版本、作者及寫作年代為方法論，奠定了新紅學基礎，「考證」小說作者、內容、寫作年代的歷史還原研究方法，也成為現代學術研究方法典範。關於胡適的小說研究理論，歷來研究成果頗多。王清輝總結晚近研究成果，認為胡適承接晚清小說界革命、五四文學

²⁴ 潘重規：《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注》，（台北：學生書局，1974），頁1。

²⁵ 潘重規：〈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收於氏著《紅樓血淚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1年），頁6、19、23。



革命社會思潮和學術思潮的背景，「整理國故」、「文學啟蒙」、「小說為文學最上乘」思潮餘緒，研究、重新評價中國章回小說，提高了中國章回小說的地位與價值，《紅樓夢考證》開創了作者研究的道路。但是小說考證法，是科學、語言文字小說研究，不是文學批評研究法²⁶。胡適自己也承認他的《紅樓夢》研究，一直是史學重於文學、對《紅樓夢》最大的貢獻，是用治經學、史學的校勘、訓詁、考據方法，用來做小說研究²⁷。然而以「小說」概念而言，胡適與魯迅相同，是擺脫了傳統中國「小說」概念中，作者、作品地位低微。傳統中國「小說」創作、批評家，偽託作者、任意竄改作品風氣。承繼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以後，現代西方「小說」概念下的作者天才觀，認為「小說」是作者蘊含個性的創造作品²⁸。在作者創作、蘊含個性的作品概念影響下，胡適中國章回小說研究，首重研究作者是誰？有怎樣個性？版本、內容的變異問題研究。他確立了作者身分神聖的地位、以作者為中心的現代小說批評研究論，也使得《紅樓夢》研究進入作者中心論典範，於是研究《紅樓夢》者，不分新、舊，皆以作者為第一研究要務（關於胡適作者研究的由來、傳承，因涉及範圍頗大，故將他文另行處理。），形成通過研究曹雪芹生平、經歷來比附或瞭解《紅樓夢》故事的曹學，與考證作者後，重新再出發的新索隱派紅學，《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研究頓時居於下風，成為新紅學為人詬病處。

陳維昭認為：胡適以古代中國「小說」實錄觀來研究《紅樓夢》，才造成此

²⁶ 王清輝：《胡適的小說考證》，（北京：清華大學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劉勇，2007）。

²⁷ 胡適：〈與高陽書（1960年11月24日）〉，收於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九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胡適：〈1961年6月21日與胡頌平的談話〉，收於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兩文皆轉引自宋廣波編校註釋：《胡適紅學資料研究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404、479。

²⁸ 關於魯迅的小說概念與承繼，參見關詩珮：〈唐始有意為小說——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看現代小說（fiction）觀念〉，（北京：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四期），頁4-22。



一缺失²⁹。但胡適晚年演講，提及他考證《紅樓夢》的問題意識是：作者是誰？作者是怎樣一個人？家世如何？家世傳記有無參考資料？內容是有根據的？還是自己關著門胡謔？版本是八十回？一百二十回？後四十回哪裡來³⁰？胡適說：作者創作內容是有根據的？還是自己關著門胡謔？這很明顯是現代西方「小說」概念中的虛構觀，而不是古代中國「小說」實錄觀的呈現。胡適也說：《紅樓夢》是一部將真事隱去自敘的書，全部書只有康熙南巡是史事，沒有其他史事可考。³¹也可看出胡適並不是完全持實錄的觀點來研究小說《紅樓夢》。

那麼問題或危機出於哪裡呢？其實是出於胡適歷史進化文學觀念，與寫實主義作者歷史還原批評法的危機。他在〈水滸傳考證〉一文云：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水滸傳》上下七八百年的歷史便是這個觀念的具體的例證。不懂得南宋的時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發生。不懂得宋元之際的時代，便不懂得「水滸」故事何以發生變化。不讀《明史》的《文苑傳》，不懂得明朝中葉的文學進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滸傳》的價值。……這叫做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³²。

由此可知，胡適將文學（小說）的產生與價值，和作者時代、社會背景劃上等號。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社會背景、文學價值觀，產生那一時代的小說。只要找

²⁹ 參見註 4 陳書。

³⁰ 胡適：〈找書的快樂〉，（台北：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十二期，1962 年 12 月）轉引自註 27 宋廣波書，頁 371。

³¹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收於氏著《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新版），頁 119-157。

³² 參見註 30 胡書，頁 42-43。



到那個時代真實的社會背景、價值的證據，才能懂得文學（小說）的發生。作者歷史的真實，提供了作者虛構小說故事的真實性與重要性，小說是作者在一個時代的真實社會背景、與文學價值中形成。再看他研究《紅樓夢》作者時，探討作者是怎樣一個人？家世如何？家世傳記有無參考資料？也可看出胡適探討作者和他的社會背景，是否有反映在小說故事中？他將作者和他的社會背景、文學價值觀，一一還原在小說故事中，試著找出價值，這其實是很粗糙的現代西方寫實主義作者歷史還原批評法。小說當然可以反映時代的鏡子，但未必是直接對映的鏡子，也可以是扭曲、破碎、反向的鏡子³³，小說也有其藝術性、技巧性，未必只是作者歷史的直接反映。但正是因為在作者歷史、社會真實性探討上，新紅學自傳典範和舊紅學索隱典範，作者歷史、社會真實性概念與紀傳本事實錄概念，其實都是秉持現實直接反映原則，因此可以互通有無，造成他們除了作者是誰？看法不同外，研究方法竟然一致。

六、余英時「新典範」：呈現「作者世界觀」的擬真故事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內收九篇紅學論文。可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是小說概念本體論兼紅學學術史論文——〈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指出紅學研究學術史，可分成評點派、索隱派、新紅學（考證派、自傳說）鬥爭論四個階段，近代紅學的中心是新紅學（考證派、自傳說），它面臨到外部歷史材料考證，多於《紅樓夢》小說內在旨趣研究，甚至偽歷史材料相繼出現的重大危機。余英時稱其紅學研究為一「新典範」，「新典範」是一種文

³³ 參見彼得蓋依著，劉森堯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1。



學考證，要回到《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注重其中包含的理想性與虛構性，假設作者的本意隱藏在小說內在結構中，兩者之間具有有機關係，必須貫穿全書才能求之。「新典範」是透過小說的內在結構來研究《紅樓夢》的創作意圖，進入作者的精神天地與理想天地。我們對《紅樓夢》的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況所知愈多，愈能把握作者的創作意圖。³⁴其次是關於作者曹雪芹傳記、社會、經濟、政治背景、思想、文化的研究論文——〈敦敏、敦誠與曹雪芹的文字因緣〉、〈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補論〉、〈懋齋詩鈔中有關曹雪芹生平的兩首詩補論〉、〈江寧織造曹家檔案中的西花園考〉、〈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指出《紅樓夢》創作受到敦敏、敦誠影響很大，曹雪芹反傳統思想是滿漢混合下的產物，他在窮途潦倒之餘，漸漸發展了一種漢族認同感，故書中偶而留下一些譏諷滿清的痕跡³⁵。最後，通過作者的研究導向作品研究，示範小說概念批評的實踐，得出作者的本意、作品的意義。認為曹雪芹透過現實生活的經歷，逐漸形成他對世界的看法，讓他在《紅樓夢》裡虛構了兩個鮮明對比的世界，即大觀園這個理想世界，和大觀園之外的現實世界。理想世界建築在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上，現實世界的骯髒又不斷地衝擊理想世界。兩個世界是貫穿全書主要線索，理想世界從現實世界而來，最終無可奈何回到現實世界，《紅樓夢》的中心意義，是曹雪芹哀悼「理想世界」的幻滅³⁶。

據此，本文將余英時「新典範」小說概念，總結為：呈現作者世界觀的擬真故事。此概念中心思想為西方「小說」是虛構故事、應該研究小說文本內在意義。亦融合了古代中國「小說」乃野史的概念，取其作者傳記、社會、經濟、政治背景、思想、文化觀念對小說創作影響，捨其如實反映論。又融合《紅樓

³⁴ 參見註 6 余書，頁 1-29、69-146。

³⁵ 參見註 6 余書，頁 147-227。

³⁶ 參見註 6 余書，頁 39-68。



夢》作者與脂硯齋的看法，「小說」是以真實人物本事為依據的敘述藝術作品。取其敘述藝術，捨其真人真事本事依據。更融合索隱派紅學民族認同「大說」議論的觀念，取其漢族認同感的呈現，舍其作者、闡述、議論歷史人物本事、道理實錄說。最後，融合自傳派紅學作者自敘傳說，取其作者考證資料，呈現作者世界觀，捨其如實反映論。透過對古代中國「小說」概念、索隱派紅學「小說」概念與研究成果、胡適紅學「小說」概念與研究成果的轉化、挪用，完成了「新典範」文學考證主張，建立了紅學研究史上，小說概念中國式的「現代意義」。

七、結論

本文透過對《紅樓夢》作者、脂評、索隱派紅學、胡適紅學、余英時「新典範」紅學，箇中小說概念的爬梳後。可以發現《紅樓夢》作者與脂評，真實人物（實事）、真實世態（實事）、深切人情（人生體驗的藝術敘述），紀實傳信、情節鋪設、性格刻畫，這些傳統中國「小說」概念，與吻合西方「小說」的概念，參雜出現在他倆的論述中。

其後，索隱派紅學學者，選擇「紀實傳信」傳統中國「小說」概念為主軸，作為評論《紅樓夢》的標準。但民國以後的索隱派紅學學者，引用西方「小說」文類名稱，稱呼《紅樓夢》為「稗史小說」。胡適紅學以西方寫實主義對應論方法，與《紅樓夢》作者、脂硯齋史學實錄概念融合，發展出作者自敘傳說。余英時「新典範」紅學，強調往昔以中國「小說」史學實錄概念，研究《紅樓夢》成果的缺失，認為返回西方「小說」虛構故事概念，才是紅學研究正途。

由此可知，脂評、索隱派紅學、胡適紅學、余英時「新典範」紅學研究，



從「傳體本事」到「虛構意圖」——紅學研究中「小說」概念的遞嬗及其影響

彼此小說概念互相影響、轉化、遞嬗的過程。其實就是古代中國傳統「小說」概念，與西方「小說」概念，互相轉化、融合、影響的過程。最後開展出具有文化匯通意義的「小說」概念——《紅樓夢》(小說)是作者擬真的再現故事。

參考書目

古籍原典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73 年)。

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5 年)。

中文專書

潘重規：《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注》，(台北：學生書局，1974)。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

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2 年 7 月)。

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 75 年)。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76 年)。

潘重規：《紅學六十年》，(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80 年)。

潘重規：《紅樓血淚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1 年)。



- 浦安迪：(Andrew H.Plaks)《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 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蔡元培等原作、龔鵬程導讀：《石頭記索隱》，(台北：金楓出版社，1998)。
-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陳維昭：《紅學與二十世紀學術思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 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台北：里仁出版社，2004)。
- 張哲俊：《東亞比較文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龔鵬程：《紅樓夢夢》，(台北：學生書局，2005)。
- 高小康：《中國古代敘事觀念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宋廣波編校註釋：《胡適紅學資料研究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 土默熱：《土默熱：紅學大突破》，(台北：風雲時代，2007)。
- 劉心武：《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台北：好讀出版社，2008)。
- 黃毅、許建平：《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視角與方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 洪濤：《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從「傳體本事」到「虛構意圖」——紅學研究中「小說」概念的遞嬗及其影響

楊星映主編：《中西小說文體比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袁進：《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期刊論文

關詩珮：〈唐始有意為小說——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看現代小說（fiction）觀念〉，（北京：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四期）。

張惠：〈中美紅學之交鋒與雙贏：周汝昌與余英時對當今紅學研究格局之貢獻〉，（北京：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五期）。

翻譯著作

彼得蓋依著，劉森堯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